

《两汉诏令》及其刻本

陈杏珍

《西汉诏令》十二卷，宋林虑辑录，程俱编次；《东汉诏令》十一卷，宋楼昉辑录。两书各自为卷，至清代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始将两书联属为一，成《两汉诏令》二十三卷。林虑，字德祖，吴郡人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其“尝试，中词学，为开封府掾。尹以佞幸进，有所不乐，引疾纳禄去，遂终于家。”程俱是林氏的朋友，字致道，开化人，举进士，高宗时为秘书少监、中书舍人，后除徽猷阁待制。楼昉，字暘叔，号迂斋，鄞县人，绍熙进士，官宗正寺主簿。从记载看，这三人都有直声，也有史才。

古人读史，病其烦而难记，散而难观，常常采缀史书，摘录资料，按类重编。摘要可省其烦，立类能合其散。这样，所需内容按类求索，灼然可考，免去翻检之劳苦。《两汉诏令》也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产生的。

此书辑自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，汇集了两汉各代皇帝所发布的诏令，它以世次先后为序，每帝一卷，以世统年，以年统月，以月统事。西汉自高祖至平帝，共录十一帝一后（吕后），无孺子婴和更始帝；东汉自光武帝至献帝，共录十一帝，无冲帝。编排条理井然，殊便观览，正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所云：

“所录不出班、范两书，然排比鳞次，使政治之得失、文章之升

降，皆可互勘而知，则较散见纪传为有端绪焉。”

《西汉诏令》目录后有大观三年程俱、林虑、蒋璿三篇序言和林氏的发刊识语，可知此书成于北宋之末，成书不久就付之版刻。《东汉诏令》末有嘉定十五年壬午楼昉后序，知此书是仿《西汉诏令》之体，续编而成。又有绍定戊子（元年）其壻范光跋，云：“《东汉诏令》成书已久……亟求饁梓，俾与《西汉诏令》并行，以续成一代典章。”可见此两书本是先后编录，分刻行世的。元至正己丑（九年）苏天爵官浙江时，将这两部诏令合刻，名曰《两汉诏令》。苏天爵字伯修，元真定人，由国子生授蓟州判官，累迁吏部尚书，参议中书省事，曾任应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，也许正因为担任这样的职务，使他注目于历史上的制诰文章。

《两汉诏令》自问世到现在，流传下来的刻本仅有元至正九年苏天爵刻本一种，此外，只存寥寥几部明清抄本。

林虑、楼昉以至苏天爵，辑录并版刻汉代诏令，堪称有识之举。

诏令是以最高统治者皇帝名义颁发的命令，其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民族关系、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。对于研究封建王朝的兴衰、典章制度的沿革、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以至整个社会矛盾，诏令是十分重要的史料。为此，历代都重视编辑诏令。在林虑之前，宋人宋敏求就编成了《唐大诏令集》。

汉代诏令较之后世皇帝的诏令，更有其值得研究的内容。

一、秦汉上承夏商周之治，下接魏晋南北朝之世，这一时期，我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经历了由形成到加强的过程。秦二世而亡，汉历数百年，有大量历史事件、名物典章制度需要研究，又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汲取，而流传下来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典籍又很缺乏。

二、史料贵在真实。后世诏令，大都委之词臣，臣僚们对朝政、对帝王的所作所为，很难秉笔直书，他们

巧运词藻，谀词颂扬功德，曲意文过饰非。这样制成的“诏令”，在反映历史真实方面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。两汉没有专设“代言”之官，王言作命，特别是一些有作为的君主，往往亲手制诏。当然汉代诏令中也有文臣代笔或者加工润色，也有权臣宦官擅政称制，但比之后世那种过于讲究形式和辞藻的诏令，忌讳少，也更有内容。楼昉序中指出：“观文帝与尉佗书，自谓高皇帝侧室之子，光武以司徒比尧，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。”这样制成的诏令，显然更有史料价值。三、汉代制诏文实兼重，写作上典雅凝重、温润浑厚，可供后世借鉴。

从陈振孙的书录和本书的序跋看，古人很注意辑录汉代诏令。

陈振孙说：“帝王之制，具在百篇，后世不可及矣。两汉犹为近古。愚未冠时，无书可观，虽二史亦从人借。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，与纪中相附，以便览阅。既仕于越，乃得见林氏书，而楼氏书近出，其为好古博雅，斯以勤矣。”

苏天爵说：“三代而降，文辞近古者，莫两汉若。一时典册诏令，混于纪传。有能取司马、班氏书，离其说，次其先后，俾读者见其爱民忧世，恤刑薄赋，遣使求贤，乞言图治，词气温雅，制作森严，甚有古之风烈。夫明君贤臣，诤谏于岩廊之上，既务合乎典礼；发号施令，敷布于海宇之内，必能格于人心。斯其上下之交孚，治忽之所关，岂偶然哉？有虞之朝，龙作纳言，夙夜出纳帝命，惟允。郑伯爵也，为命，裨谏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脩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况后世有天下者，涣汗大号，鼓舞兆民，皆出治之本，经国之要，岂可以私智独见而为之乎？……然则帝王之制，固本于五十八篇之《书》，而《两汉诏令》亦不可忽也。”

程氏序说：“古之盛王，与道为一，故其酬酢之间，理言遗事，皆足以为万世法……自五十八篇而后，起衰周，至五代之

末，又千数百载间，其为诏令，温醇简尽而犹时有三代之遗法者，唯西汉为然。其进退美恶，不以溢言没其实；其申飭训戒，皆至诚明白，节缓而思深。至丛脞大坏之余，其措置虽已不合古道当人心，然犹陈义恳到，雍容而不迫。此其一代之文，流风未泯，顾犹不可及，又况文实兼盛哉？”

林氏序说：“西汉接三代末流，训词深厚，文章尔雅，犹有浑浑灏灏噩噩之余风，下视晋魏周齐陈隋，号令文采卑陋甚矣。三代而上，超轶绝尘，不可方驾。学者勉追古人，庶乎接武汉世，不犹愈乎？”

楼氏序说：“走幼嗜西汉书，每得一诏，辄讽味不忍释。噫！一何其沈浸浓郁、雍容雅裕、入人之深也。暇日，常欲掇其散在志传者，附之本纪，考其岁月，以类相从，粹为一编，因循未果，而吴郡林君德祖之书传焉，走可以无述也。……窃不自揆，仿林君前书之体，纂次成之，目曰《东汉诏令》，非敢传之他人，亦聊以备遗忘。”

这些学者，言必称三代，充满了对儒家理想社会的赞美和向往。今天我们如果撇开他们的复古思想和对于两汉诏令的溢词，仍可以看到，他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，他们的研究成果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。

苏天爵刻《两汉诏令》时，将南宋洪咨夔的《两汉诏令总论》收入此书。洪氏辑有《两汉诏令览钞》一书，可惜已失传。洪氏的《平斋文集》，国内公藏图书馆书目中尚无刻本，更无宋元善本，只有几种清代抄本。洪氏《总论》是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，对汉代诏令制度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史。苏刻《两汉诏令》中，完整地保存了《总论》一文，为学者们提供了较早的版刻文字资料。

苏天爵刻本《两汉诏令》，一般读者很难见到，而初印本则更难见到。至于完整的苏刻本，不知今日世上是否还存在。北京

图书馆藏有苏刻本四部，均为残帙。现介绍如下：

一、清内府旧藏本，共存八卷：西汉卷一至四、六至八，东汉卷一。存卷中尚有缺叶。比之它本，此帙较佳。此本印刷较早，纸质较好，墨色乌黑，字迹疏朗醒目，栏线分明，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细黑口，对黑鱼尾，四周双边，版心下镌刻工名。此本较能反映元人刻本的版刻艺术。而北图藏其他三部均为后印本，有的版面已模糊不清，有的版面经过修补，文字错漏舛误，有的细黑口已磨粗，变成一般黑口了。此本可以补订后印本和抄本中的缺误文字，同时，它还有以下几点优胜处：（一）此本幸存卷二目录和正文，而另外三部，卷二目录依稀难辨，正文均已亡佚。查其他图书馆藏本，苏刻卷二较为罕见，此卷或缺，或为后人抄配。（二）此本完整地保存《目录》、苏天爵刻书序和洪咨夔《两汉诏令总论》，而另外三部，目录中有的文字很难辨认。苏序或为抄配或有错漏，《总论》无一完整，唯靠此本订补，（三）此本原是三册初印本拚凑成帙，其第三册为蝴蝶装，保留了早期的书籍装帧艺术形式。

二、莫友芝旧藏本，后归涵芬楼。存二十二卷，缺西汉卷二。书中钤有“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”。本书缺苏序，《总论》缺三、四两叶。西汉卷前有程、林、蒋三序和林氏发刊识语，卷十二后有程俱《西汉诏令后序》。一前一后，两篇程俱序，前篇无标题，首句作“右西汉诏令四百一章”，后篇有标题，首句作“西汉诏令凡四百一章”，除此之外，序言文字相同。一书中将同一篇序文刻印两遍，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。《东汉诏令》末有楼昉《东汉诏令后序》，与程俱后序相呼应，还有绍定戊子（元年）婿范光跋、绍定癸巳（六年）门人郑清之跋。这一部保留下来的刻工最多，刻工名字印得比较清楚。如：李章、李友文、占仲亨、何秀父、谢成、倪施、齐、才、何、可等等，熟悉这些刻工，对于鉴别这个时期的一些刻本很

有帮助。

三、潘祖荫、盛昱旧藏本，后来也归涵芬楼。此书也存二十二卷，缺西汉卷二。书中钤有“伯寅藏书”，“宗室文愬公家世藏”、“宗室盛昱收藏图书印”、“不在朝廷又无经学”等印记。此本存苏序，有程、林、蒋三序和林虑发刊识语，《总论》佚去第三至五叶。东汉卷末无楼昉后序及范光、郑清之跋。

四、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本。书中有“叶氏藏书”、“光轮印”、“南阳讲习堂”、“玉峰徐氏家藏”、“沈印廷芳”、“椒园”、“购此书甚不易，愿子孙弗轻弃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记。从藏印看，此书历经叶奕苞、吕留良、徐灿、沈廷芳、常熟瞿氏等著名藏书家收藏。此本有《总论》，但缺三、四两叶，有程、林、蒋三序及林氏发刊识语，也有程俱后序和楼昉后序。但因缺苏天爵序，加之苏氏刻书时保留了宋讳，“匡”、“桓”等字减末笔，因而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误定本书是“南宋时合刊”。瞿氏后来发现鉴定错了，抄配了苏序和东汉卷一第二十一叶、卷七第五、六两叶及范光、郑清之后跋四叶。抄配中的缺字、错字很多，须靠初印本来订补才能成句读。

总起来看，这四部元刻本互相取长补短，才能反映苏刻本的原貌。另外，原内府旧藏本缺西汉卷十一、十二，其余三部虽有这两卷，但卷十一缺末叶，《免孙宠息夫躬诏》文字未完；卷十二存十叶，《议九锡诏》只剩标题，无正文，《九锡策》、《遗诏》全文缺。这两卷，尚未知道何处有元刻全帙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